

儒学的日本化进程及其特质分析

钱露露

(盐城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儒学的日本化进程大致经历了初步传入、发展嫁接以及全盛内化三个历史阶段。传入时期的儒学未能渗透地方,对日本固有道德观念的影响较小;发展时期的儒学大量嫁接中国儒学中皇权至上、以德治国、以礼为本等思想理念,但同时也保持着理性的取舍态度;全盛时期的儒学进一步调整中国儒学的主要德目,表现出“重融合、重忠诚、重实践、重实用、重感情”的重要特质,并在此影响下形成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民气质与价值理念。

关键词:儒学;嫁接;内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B3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1)02-0064-05

古代日本对于近邻国家尤其是中国大陆文化的吸收向来以范围广、规模大而著称,从先进的有形物质文化到无形的技术工艺、政治制度乃至价值理念,均由浅入深、毫无抵制地加以学习引进。在这从无到有的吸收进程中,日本民族所固有的文化特性亦即原生性“和魂”,则至始至终保持着稳定的性状。即使是导入了外来强势的价值理念,亦能在“和魂”的作用之下作出相应的变形,并使之日本化。以儒学为例,从王仁赴日至江户幕末,就经历了从扎根到全盛、从附庸到独立、从嫁接到改造的历史性转变。在儒学传播发展的任一时期,日本固有文化在与中国儒学的交融中始终保持着理性的取舍态度。即使是在“全盘东化”的嫁接时期,日本也是依据实际需要而有所选择地导入儒家思想。进入全盛时期后,日本更是进一步调整中国儒学的重心及其主要德目,并使其内化为日本人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形成了日中两国不同的民族气质与民族精神。

本文即以上述的东传儒学为研究对象,借助儒学在日传播发展的时代线索,从社会学、历史学等角度深入分析不同阶段背景下的儒学发展路径,探讨日中儒学的特质差异及其成因,以期为我们进一步解读日本民族性格以及理解日本文化的发展踪迹提供帮助。

一、儒学的初步传入

关于儒学初传日本的具体时间和路线,目前学界虽无缜密考证,但一般认为,中国儒家经典是于公元五世纪前期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据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720年)记载,应神天皇16年(405年),皇太子拜朝鲜汉学教师王仁为师,学习中国儒学经典。王仁赴日时曾“献《论语》10卷和《千字文》1卷”^[1]。这是儒家经典与中国汉字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同时也成为中国儒学东进日本的肇始。

儒学于公元五世纪期间传入日本的这一史实,亦能从保存至今的日本五世纪文书及文物中得到印证。转录于中国正史《宋书·倭国传》中雄略天皇表文(478年)中的“王道融泰”、“帝德覆载”、“以劝忠节”^{[2]167}等语句就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此外,从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铭文中,亦有“长寿子孙注得其恩”^{[2]168}字样,亦显儒家思想。

儒学的传入期从王仁赴日之时起算持续近约百年。这一时期,中国儒学经典通过中朝海陆两种渠道陆续传入日本,但是此时儒家经典所发挥的功用仅是作为日本贵族阶层学习汉字的识字教材而被阅读。自公元六世纪起,日本才开始逐步

收稿日期:2011-03-23

基金项目:盐城工学院科研基金项目(XKR2011036)

作者简介:钱露露(1983-),女,江苏滨海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日本历史与文化。

关注并系统学习儒学思想及其经典奥义,并从百济以轮换方式聘请五经博士赴日讲学。如“继体天皇10年(516年)高安茂到日,替换段杨尔;钦明天皇15年(554年)王柳贵到日,代替固德马丁安”^[3]。但是由于讲习代价以及轮换制下五经博士人数的限制,儒学在日本仅影响到极少数皇室成员及贵族,未能波及地方百姓。因此,日本社会在公元五、六世纪期间仍然普遍处于感性而未开化的蒙昧状态,固有道德观念亦表现得相当原始与混沌,道德、法律与感觉往往混为一谈。这一社会写照与同一时期儒学发展达至鼎盛的中国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二、儒学的发展与嫁接

公元7世纪起,日本上下掀起了一股学习儒学的巨大浪潮。日本官方一方面从中国大规模输入儒学典籍,派遣使者及留学生翻印、研习儒家经典。据记载,“仅平安朝初期传入日本的典籍就达1579部,16790卷之多”^[4];另一方面则在国内设置了完备的学校系统,通过中央“大学寮”和地方“私学”二级体系传播儒学。大学寮是日本古代的国家级学校,相当于唐制国子监。而私学则是与大学寮等贵族教育机构相区别,面向庶民开办的以学习儒学经典为中心的民间私塾。在奈良、平安时代的几百年间,上述学校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日本青年,从而使早期儒学在地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这无疑也为后来王道思想以及君臣观念在民间的普及贯彻预备了土壤。

那么,儒学在日发展的真正动力何在?我们认为,部分学者所提出的因本土神道教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而被儒学“趁虚而入”,固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但是,能够迎合统治者对于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以及维系社会安定的需要,应该才是儒学自上而下得以快速普及的根本原动力。正如学者关松林所言:“早期儒学是日本儒学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阶段。它对于日本文化的影响程度虽不及江户时代儒学,……但其政治功用却超过了其它时代的儒学”^[5]。这种“政治功用”或许可以理解为为“奈良—平安时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政治理念,从而被日本统治者有所选择地嫁接了过来。

首先,鉴于建立皇权至上的集权国家的需要,日本嫁接了中国儒学的“王土王民”思想。依据

儒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等理念,圣德太子于《十七条宪法》(604年)中明确了君权至上的重要原则。如第三条“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覆地载,四时顺行”、第六条“无忠于君,乃大乱之本”以及第十二条“国靡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先”等无疑强调了君主至上的地位和臣子绝对服从的义务,其目的在于将国民统一在以天皇为核心的集权统治之下,使天皇成为国民信仰的中心。

其次,日本嫁接了中国儒学“以德治国”的仁政思想。作为“德”的实践,圣德太子制定“冠位十二阶”(603年),将“德”置于中国儒学“五常”——“仁、礼、信、义、智”之上,从而形成了大(小)德、大(小)仁、大(小)礼、大(小)信、大(小)义、大(小)智等冠位序列,旨在以此评价德行、教化贵族。此外,“任人以贤”、“使民以时”、“勿敛百姓”等体现仁政原则的道德训诫更是比比皆是。只不过上述仁政思想提出的目的在于强调天皇对于国民和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可见其落脚点仍然在于君主集权,即“仁”必须以“忠”为前提。这与中国儒学“仁者爱人,推恩及人”的纯粹仁政观有很大的不同。

再次,日本还导入了中国儒家“以礼为本”的重要思想,并将其写入《宪法》第四条中,曰:“群卿百寮,以礼为本。”此后,日本历代统治者极为强调“为政之道,以礼为优”。可以说,儒家重礼的道德训条被日本社会世代继承,并且沿用至今。“这是因为它适合于日本人谨慎、细腻、委婉的性格特征,因此至今仍是日本人所尊奉的人际交往原则”。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文化所强调的“礼”并不包括两性伦理之“礼”,平安名著《源氏物语》中对于异性恋爱的描述随处可见,似无中国儒家“男女授受不亲”之禁忌。由此可见,“符合日本民族心理与性情的文化理念会长久地保留于日本文化之中,成为日本现实生活中‘活的文化’”^[6]。而那些压抑人性与情感、不符合日本民族心理的文化理念则绝无可能渗透进日本文化的深层。

综上,儒学的发展嫁接期与上一阶段的传入期相比,其影响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要更为深入,并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特点。第一,儒学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由中央贵族阶层逐步波及地方民间百姓;第二,儒学经典不再视为识字教材,而是转变为日本国民精神修养和文化素养

的教科书与治国宝典;第三,儒学的传播依旧依靠官方倡导,在道德实践层面上所发挥的实效不大;第四,日本对于中国儒学的嫁接始终有所选择,积极择取儒家文化中于己有用的部分(如集权、崇德、重礼等思想),而不适于己的部分则毫不吝惜地舍而弃之(如贞洁观、孝悌观),这一原则贯穿于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历史的始终。

三、儒学的全盛与内化

进入武士社会后,日本对于儒学经典的输入和学习热情更是空前高涨。据记载,1211年至1241年的30年间,日本禅僧俊苾、园尔先后从南宋携回书籍3000余部,其中包含《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精义》等朱子学著作1458部^[7]。不仅是日本禅僧,宋元时期的著名中国禅僧兰溪道隆等人亦在日本弘布朱子学说直至终老。俊苾等日本禅僧功在将大批朱子学著作引入日本,而中国禅僧赴日则着重于朱子学义理的阐发,从而使儒学传播更为深入。到了江户时代,朱子学在藤原惺窝和林罗山的推动下开始摆脱佛教禅宗的束缚,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朱子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官学独尊的至高地位,是因为其扬忠抑孝的思想理念迎合了德川幕府的政治需要。但是,真正标志儒学进入全盛期的历史依据并非是以弘扬忠诚观为己任的朱子学派的一家勃兴,而是儒学各派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例如十七世纪前期兴起的阳明学派反对朱子学说的教条理论,重视将个人的道德修养哲学转变为改造社会的行动哲学;再如十七世纪中期兴起的古学派,亦与朱子学派针锋相对,主张“复古求真”和“经世致用”,试图从古典中寻求对现实生活有用的智慧。各儒学流派对于朱子学派的颠覆,亦可视为作为日本固有文化对于东传朱子学的二次改造,赋予了日本儒学在中国儒学本身所难以找到的“重融合、重忠诚、重实践、重实用、重感情”的独特内涵,并且逐步将其真正地内化于日本国民的价值理念之中。

首先,日本儒学体现出注重吸收与融合的特征。中国儒学的排他性特征似已被目前学界所公认。但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儒学却是在不断吸收与融合其他诸家学派思想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的中国早期儒学的确具有较强的包容能力。只不过在其正统化以后方才体现出自守排他的特点。然而,东进日本的儒学依

旧承袭了这一“能力”,且其并未因时代的变迁或朝代的更迭而发生本质改变。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早期儒学没有出现儒、佛、神道间的思想对立;镰仓、室町时代的日本儒学则强调“儒佛同性”和“儒佛双修”;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虽取得了官学至尊的地位,但也并未影响和压缩其他思想流派的生存空间,相反却提倡共存与融合,主张“神儒一致”和“神儒合一”,十七世纪中期朱子歧门学派所倡导的“儒神同盟”就是明证。毫无疑问,这种吸收性与融合性特质伴随着儒学的流播而彻底地内化为全体国民的价值理念,并在战后经济复苏和技术引进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上事实都反映了日本民族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十分注意保存固有思想并将其相互融合的优良传统。

其次,日本儒学体现出注重忠诚、轻视德孝的特征。中国封建社会历来重孝,如《孝经·三才章》有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认为“孝”乃人们必须遵守的天经地义的伦理纲常。宋儒更是将“孝”与“忠”紧密联系,认为孝乃忠之前提,道德之根本。此外,“有德者王天下”亦是中国儒家的政治思想,既强调统治者应以修身立德为第一要务,同时也强调“无德之君”可通过异姓革命加以“放伐”。早期日本儒学基本接受“孝”与“德”的观点,但至十七世纪中期以后,“孝子顺孙”、“有德者王”等思想则逐步淡化,代之以片面强调对于君主,进而对于天皇的无条件忠诚。这是因为上述思想并不适应天皇万世一系的“国体观”。作为实践,山崎闇斋极力宣扬“天皇宝祚天壤无穷”,提倡极端的忠君报国主义;山鹿素行则主张“主君之恶纵如夏桀殷纣,而下无蔑上之道”^{[8][7]}。可见,与主张君臣双向道德义务的中国儒学相比,日本儒学则更为强调单向性无条件的绝对忠诚。“这种已然丧失了人本主义色彩的忠诚观念造就了日本民族尽忠尽职的工作情操,同时也助长了歇斯底里的全民意识和法西斯式的侵略行径”^[9]。

再次,日本儒学体现出注重实践与实用的特征。“知行合一”理论虽最早由中国阳明学者提出,但大多数中国儒学者只是在内心世界中追求消极的心理平衡,少于行动。相比之下,日本儒学者则有所不同,他们更为重视“行”的思想,将“行”理解为行动与实践。正如学者王守华所言:“日本的儒学强调‘知行合一’,并将其引向‘实行实功’,把‘即知即行’的理论付诸经世致用的现

实实践,视‘知识’为改革社会、经邦弘化的真知识,视‘行动’为将真知付诸实践的具体行动,甚至将‘知行合一’与置生死于度外作同义解释,以激励人们知而必行、行而不息,甚至以身殉行的求实精神”^[4]。因此,日本大多数儒学家十分重视经验与实证,如贝原益轩认为,“接触外物即可逐一通晓其理”;五井兰洲认为,“真知和实见是穷理之神明”;荻生徂徕则认为,“格物就是习熟和力行”^[10]。由于注重事实是理性认识的前提,故而日本民族更加容易面向世界,更加容易接受近代西方科学,这也对日本近现代的文明开化和富国强民局面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次,日本儒学体现出注重感情色彩的特征。中国儒学向来以“玄妙精微”自我标榜,其指导世俗社会的伦理教条亦难免晦涩难懂。以对于“诚”范畴的解释为例,《孟子·离娄上》讲“诚者,天之道”,将“诚”高扬为人生最根本的内在主体道德要求;《礼记·中庸》讲“诚”是天人合一之道,是“可以前知”的“如神”的认识妙经;《通书·圣第四》讲“诚”是“寂然不动者”,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不难看出,中国儒学中的“诚”依照“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逐渐升华为揭示世界统一性的高度抽象的哲学范畴。这一概念代表了极高的抽象思维水平,但也使“诚”失去了原有的情感色彩。相比之下,日本的儒学者则更多地从人情伦理的角度阐释“诚”的本源,对“诚”作出了不同于中国儒家道德理念的日本化阐释。如藤原惺窝讲“诚”即“父母慈爱之真情实感”;山鹿素行讲“诚”是“不得已(不可抑制)之人情”。可见,日本儒学认为“诚”是“情”之“诚”,理论未必高深,但却贴近人生,容易成为民族道德实践的指导力量。在“诚”的作用之下,日本民族表现出了对于“情”与“欲”的极大宽容,认为“去人欲非人”^[8]^[10],倡导追求感性快乐与人性自由,这与冷酷禁欲的中国儒学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敬畏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

最后,日本儒学还体现出缺乏抽象与空想的特征。中国儒学向来注重道德修养与人生哲学的

探讨,故而并不十分热衷抽象的本体论研究。日本儒学较之中国儒学则更为疏于抽象本体论的思考,例如奈良、平安时期的儒学主要表达儒家的政治理念;镰仓、室町时期的儒学属于佛教附庸,儒学者无法独立展开理性的思维创造;江户时期的儒学虽已一家独大,但中国朱子学中思辨性最强的本体论也未能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即使接受了“理”这一范畴,日本儒学界也更多地将其理解为与经验事物相联系的自然规律与道德准则,而非形而上学的世界本体存在。如藤原惺窝将“理”理解为伦理性质的“义理”,即“人事即天理”;山鹿素行则认为,“理”是“天地人物”的“条理”^[8]^[10]。由此可见,日本儒学者对于“理”范畴的认识,充分反映了日本儒学文化疏于抽象本体论思考的特色,这也直接导致了日本民族思维方式“拙于思辨与逻辑,缺乏以抽象的普遍形式进行空想”^[11]的这一特点。

综上所述,“日本儒学是从中国儒学中吸取营养,并以中国儒学的发展为原动力而逐步成长起来的”^[5]。儒学进入日本后,之所以能够在毫无排斥的状态下快速流播,这与日中两国均重视现世的人伦关系密不可分。但是,“日本儒学又并非是中国儒学原封不动的照搬,而是经过日本文化改造的变型物”^[5]。奈良、平安时期的儒学,表达的是建设中央集权体制的政治理念,区别于同一时期中国儒学“修身立德”之内涵;镰仓、室町时期的儒学,表现出“佛儒不二”的特点,区别于同一时期中国儒学一家独大之局面;江户时期的儒学,重视融合、忠诚、实践与事实,区别于同一时期中国儒学“重保守、重德行、重理论、重思辨”之特征。我们认为,儒学的日本化改造一方面取决于日本民族在吸纳外来文化方式上的实用主义理念,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日本民族固有思维方式上的行动主义与情感至上的独特性。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独特性,从而决定了儒学在日本的发展道路,同时也决定了日中两国截然不同的国民气质和价值理念。

参考文献:

- [1] 王桂. 日本教育史[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4.
- [2] 王金林. 古代日本[M]. 东京:六兴出版社,1986.

- [3] 吴廷缙. 日本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40.
- [4] 方国根,罗蒙. 中、朝(韩)、日儒学思想理论特色摭论[J]. 社会科学战线,2005(4):21-31.
- [5] 关松林. 吸收与改造: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63-66.
- [6] 杨薇. 日本文化模式与社会变迁[M]. 济南:济南出版社,2006:72.
- [7] [日]西村天因. 日本皇学史[M]. 东京:梁仁堂书房,1909:12.
- [8] 叶渭渠. 日本文明[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9] 叶磊. 稻作农耕与日本民族的稻作文化性格[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31-136.
- [10] [日]奈良本辰也. 近世日本思想史研究[M]. 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65:108.
- [11] [日]中村元. 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M]. 东京:密苏兹书房,1948:28.

An Analysis on The Japanization Course of Confucianism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QIAN Lu-lu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51, China)

Abstract: The Japanization course of Confucianism can b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periods in history – initial imported period, developing and grafting period, big developing and internalizing period. During the importing period, Confucianism hadn't penetrated the local areas, therefore it had little influence on Japanese innate moral ideas, while the Confucianism in its developing period greatly cited from Chinese Confucianism such ideology as supreme imperial power, administering a country by virtue, and taking propriety as the basis.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very rational in accepting and rejecting them. Confucianism in its big developing period made more adjustment in moral items of Chinese Confucianism which put up the important traits of “valuing toleration, practice, loyalty, filial piety and lov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hich a totally different national character was formed.

Keywords: Confucianism; grafting; internalizing; traits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李 军)